

(上接第一版)早在1940年代初,在金陵大学任教时,程先生为开设文学概论一课,编写了题为《文学发凡》的教材(后来先后改名为《文论要论》和《文论十笺》),在《后序》中,他表述编写此书的动机:“辛巳、壬午之间,作者承乏武汉大学讲习,始与诸生专治文学者接谈,其言之凌杂肤浅,往往出意外。知近世短书,累害至深。因取前哲雅言授之,俾典于学。期年,稍稍解悟。旋移教金陵大学,从游所病,亦与向等。”说明他教的虽然是古典,立意却在当下。结合这次和本科生座谈的内容,可以看出,这个思路程先生坚持了几十年。

### 对于毕业了的研究 生,他也要“扶上马,送一程”

程先生惜别了本科生的讲台,但他的心并没有离开,除了像上述和本本科生的接触外,他还把很多心思放在了我们这些即将走上讲台、或刚刚走上讲台的学生身上。他曾经说过,对于毕业了的研究生,他要“扶上马,送一程”。这不仅体现在研究上,也体现在教学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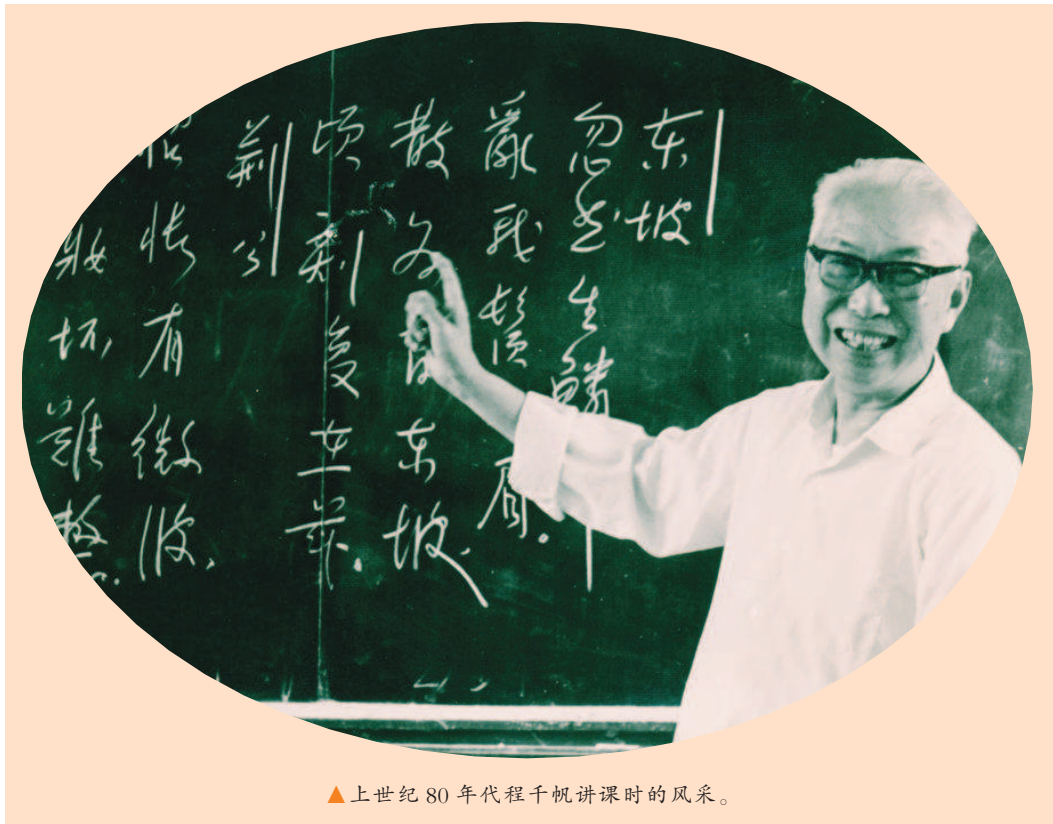
1984年底,我硕士论文答辩结束,已经确定留校任教,按照程序,需要试讲,试讲的篇目是李白的《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》。程先生非常重视,不仅推荐参考资料给我,而且试讲时还专门到学校来坐在下面听,听完后又和其他老师一起细加点评。我正式走上讲台后,他对我说:“一个老师,能够在讲台上站稳,这样才算真正有了安身立命之所。”有一次程先生说想到我课堂上去听听课,不过他后来想了想,怕年轻人这样更紧张了,最后终于还是没去。

程先生这样注重对年轻教师教学初体验的引导,其中有他自己的亲身感受在。抗日战争时期,他流亡四川乐山,在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教语文,当时武汉大学也在那里,文学院院长刘永济先生和程家是世交,对他非常赏识,就推荐他到武大任职,教三个班的大

一国文。刘先生素以严格著称,从来不轻易推荐人,所以对于所推荐者,也非常负责。当时程先生才28岁,很年轻,经验少,考虑到这个情况,程先生讲课时,刘先生就悄悄地在隔壁听,一连听了一个星期,觉得讲得不错,这才放心。但两人共事之时,刘先生始终没有提起过此事,一直到数年之后,偶然的情况下,程先生才从师母处得知。对这位学问渊博精深、人格伟岸高峻的世丈,程先生是衷心钦服的。这种精神,程先生也继承下来了。只是现在的教室,都是水泥混凝土结构的墙壁,在隔壁恐怕听不清楚,况且,也无法保证隔壁教室没有其他课,因此,程先生才说要进教室来听的吧。

我刚开始教书时,至少有两门课程先生是亲自把关的,一门是必修课中国文学史,一门是选修课明清文学专题研究。我写的教案他都要过目,而且就像对待我们的学术论文一样,在上面详细作批,提示重点,指出需要改进的地方。他指导得非常具体,曾特别提到在讲课时,要掌握所讲授的内容的分量和讲授的速度之间的关系。他说,根据自己的经验,课堂讲授一个小时,需要写大约2500字,这样才能互相对应。但他并没有停留在这一步,而是进一步要从教学效果上去检验,即了解同学的反馈。我刚开始走上讲坛,虽然态度比较认真,准备也还充分,但在分寸的把握、难易的程度、教学节奏的处理、教材内外的关系等具体层面,不免要有一个摸索的过程。程先生认为这都是正常的,但需要及时总结。

有一次,他了解到学生的一些反馈,就专门将我找到家里,和我讨论教科书和讲授内容之间的关系问题。他说,教课,重要的原则之一,就是对教科书的书里书外之间关系的拿捏。讲文学史,基本史实不能虚构,在这方面,大家肯定都是差不多的,因此,无法也不能离开教科书,但是,怎样去讲教科书上已有的知识,每个人还是可以有不同的处理。他说,在这个问题上,要会“填空”。所谓“填空”,就是前后勾连,内外贯通,对书中省略的,要能够指出;对学术



▲上世纪80年代程千帆讲课时的风采。

界的动态,要能够更新;对相关结论的形成,要能够还原……他特别提出,要加深自己的学养,并充分体现在教学中,这样就能随时联想生发,具有举一反三的能力,既能入又能出。“填空”这两个字,是程先生非常精彩的表述,既是大原则,又有可操作性,我一直念念不忘,而且受益无穷。

而要做到这一点,也和上课之前的状态有关。程先生曾对我说过,他如果要上课,前一天晚上就其他什么也不做,完全沉浸在要教的内容中,并且要精心设计,以便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。用当时的话来说,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。

当然,这种表述,体现的是程先生对上课的重视和认真,是对一种教学态度的强调,也不可拘泥看待。事实上,程先生天分既高,学养也厚。即以诗词而言,他对不少作品都能背诵,平时谈话信口而出,非常精彩,甚至有些诗话、词话,他也能背诵出来。这是我们师兄弟共同所见,也一致印象非常深刻。

对于教学,程先生还非常强调的一点是,人无完人。在课堂上,任何一位老师都不能保证自己没有一点错误,他叮嘱我:一旦发现自己出了错误,一定要及时告诉学生,加以纠正。事实上,他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。他说自己来到南京大学,给本科生上课,有时不小心还会讲错。他曾和同教研室的吴翠芬老师交流过某些讲课内容,吴老师了解程先生的气度,有不同意见,当时就会提出。而程先生也虚怀若谷,第二天在课堂上,就将自己和吴老师的这番沟通告诉学生,说上一次的某些讲法有不妥,应该更正。在程先生看来,对于老师来说,这也就是敬业。他经常对我说,我这么大年龄了,人们也不好意思提不同意见,所以,对那些能够给我提意见的人,我都非常感谢。

### 教学相长,日新其德

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这句话,人人都会说,似乎意思也并不难

懂,但里面有着非常丰富、具体的内涵,在不同的人身上,可能有不同的表现。对于一般教师而言,教什么课,往往有个大致的方向,教了几轮之后,轻车熟路,也就往往有了惰性,不愿意轻易更换跑道,毕竟,开设新课,总要用去很多时间和精力。但程先生却不是这么想。一方面,他认为,要树立学生为本的意识,学生的需要,就是老师的责任,学生需要什么课,老师就应该开出什么课;另一方面,学生有可塑性,老师也有可塑性,并不能说,某些老师只会开某些课,

更远。但看到没有人愿意承担,程先生也主动接下来,自己不熟悉,就先听丽尼(郭安仁)的课,逐渐进入状态。程先生精心准备,将这两门课上得非常精彩,效果很好,非常受同学的欢迎。但是,程先生晚年说起来,略去了自己准备课程的艰辛,往往特别强调在这个过程中所受到的益处。例如,他教文艺学课,需要在中西文学结合的前提下思考问题,从而培养了理论思辨的能力。

众所周知,程先生是当代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中,



▲1991年程千帆和他的第二届博士生(右二为本文作者)。

而且必须一直开这些课,适当开新课,对老师本身,也是一个提升,也能促进科研。就像他所说的:“教学和科研决不矛盾。反之,也可以说是教学相长。在教学中可以发现问题,从事科研。科研的结果,可以反过来充实教学。如此循环,就可以日新其德。”

上世纪40年代后期,吴于廑先生担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,他认为历史系的学生不能只读历史,至少也要读一门中国文学史和一门中国哲学史,从上古到近代,一年讲完。但这门中国文学史,其教学目标、课程设计、授课时间等,和中文系原来的类似课程差距很大,没人肯教,于是作为中文系主任的程先生就自己接下来。1950年代初,高等教育学苏联,需要设计一些新课,如文艺学。这类课,中文系以前少见,与作为古代文学教师的程先生距离

最具有方法论意识和理论追求者之一,他提出的“古代文学理论和古代文学的理论”的观念,被视为对当代古代文学研究的重大贡献。而他和师弟兄章焯合著的《程氏汉语文学通史》,提纲挈领,要言不烦,既给出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清晰线索,又弥补了以往同类文学史著作的一些不足,体现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成就。不得不承认,这两个方面成绩的获得,和他当年开设的那两门课有关。程先生常对我们说,生活中应该顺势而为,虽不能样样都称心,但被动选择中有主动意识,也能不断得到进步。

以上这些,是我零星想到的,虽然不成系统,却也能集中地指向两个字——师范。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:学高为师,身正为范。用在程千帆先生这里,非常恰当。

端角数枝梅  
凌雪探自开  
遥知不是雪  
为有暗香来

陈仲志先生为  
程千帆先生书

程千帆  
书

▶程千帆书法作品。



◀1999年程千帆获南京大学中文系首届优秀学科带头人称号,时任校长蒋树声为其颁奖。